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第十四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第十四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三月

△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 1/4 插页2 字数160,000

一九八一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八一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

统一书号:11072·80

定 价:0.72 元

目 录

张家口抗日同盟军事变的前前后后.....	李华生(1)
回忆北伐——南昌之役	方之中(40)
战斗在海陆丰的几个片断.....	周铁忠(50)
回忆高蠡起义	翟家骏(64)
抗日战争中的冀东《救国报》	陈大远(81)
回忆天津文化人联合会	王希贤(98)
津门曲坛沧桑录.....	张鹤琴(116)
天津时调的演变.....	姚惜云(160)
舞台生活六十年.....	骆玉笙(170)
回顾我的艺人生涯	张寿臣(196)
我的学艺经过	郭荣起(206)
图片八幅	(插页)
订正·补充	(224)
补 一九三二年磁县小车工人的罢工斗争(49)	解放初期的
白 清唱社(159)	记骆玉笙二三事(169)(195)

张家口抗日同盟军事变 的前前后后

李 华 生

东北沦亡，华北形势危急——华北抗日运动掀起新高潮——张家口抗日同盟军的兴起——撤出张家口，抗日同盟军遭受失败——抗日同盟军失败后，重新部署北方工作——创建绥远抗日根据地——发动陕北游击战争

一、东北四省沦亡，冀东失守，《塘沽协定》签字，华北形势危急

长期以来，日本侵略我国，处心积虑，非亡我不止。一九二七年（日本昭和四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召集内阁有关满蒙官员的东方幕僚会议，讨论制定了侵略我国的凶恶计划，上奏天皇，即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在这个奏折中，田中总结了一八九四年（甲午年）中日战争后占领朝鲜、台湾的经验，提出了征服满蒙，征服中国全土，征服世界的三步骤。经过充分准备之后，日本认为侵略我国时机已经成熟。一九三一年七月日本在吉林制造了“万宝山惨案”，八月日本伪造中村大尉“失踪”事件及南满铁路“柳

条沟桥被炸”事件等，又于同年九月十八日夜突然攻占沈阳火药库、北大营，发动了侵略我国的“九·一八”事变，于十九日晨占领了沈阳。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制炮厂及二百余架飞机和大量军事装备俱落入敌手。十九日日本占领长春以南包括长春在内的本溪、辽阳、鞍山、海城、营口、盖平、安东等十八个重要城市和地区。二十日日本占领熊岳城打通了至旅大一线。二十一日日本占领吉长路、吉敦路全线。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占领四洮路、洮南郑家屯及通辽。在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下，为时仅及一周日本便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很快日本于十一月占领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等地区，十二月占领锦州。数十万东北军全部退入关内，东北遂告沦亡。一九三二年三月日本利用溥仪建立了“满洲国”。

为加速侵占华北步伐，日本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占领山海关，二月二十五日分三路进攻热河。该省主席汤玉麟在日军未到达之前率部以二百四十辆汽车满载金银财宝及鸦片南逃。日本以一百八十名骑兵于三月四日占领承德。热河全省八天之内被占，然后并入“满洲国”。接着日本乘胜进攻长城沿线，中国驻守长城各口部队，商震、冯治安、王以哲等部奋起抗战。这就是一九三三年三月至五月的长城抗战。三月十一日至十七日由于中国军队奋战，使日本服部旅团遭受惨重打击。长城抗战无论从军事上、政治上来讲，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是东北四省沦亡后，中国军队在华北第一次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命令而自动奋起抗击日寇的战争，它是张家口抗日同盟军事变的前奏。当时国民党在华北平津一线驻军有三十多个师，不下数十万人。蒋介石决心卖国，不但不予任何支援，反而亲赴河北命其嫡系部队黄杰、关麟徵等部监视和钳制长城各口的抗战

部队，又一次下令禁止中国军队进行抵抗，并重申：“侈言抗日者杀无赦”，极力为日本进攻扫清道路。使长城各口苦战的部队陷于孤立无援之地，惨遭失败。日本于三月二十日集结重兵猛攻冷口，四月十一日建昌营失守，迁安被陷。喜峰口后撤，临榆、抚宁、昌黎及滦东各县失陷。四月二十九日古北口、南天门撤出，日本渡滦河而西，占领丰润、玉田、三河，卒于同年五月十二日占领离北平四十里之通县。平津暴露于敌进攻直接威胁之前，华北垂危。

国民党蒋介石派了一向主张“中日亲善”的亲日派政学系政客黄郛北上与日本谈判，经英国驻华公使兰浦生出面调停，中日双方代表在密云会谈，于五月三十一日在塘沽签订了屈辱的卖国协定。中国方面是何应钦主持的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及钱宗泽、殷汝耕、雷寿荣等，日本方面是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及喜多诚一等。条约规定主要内容如下：

1. 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县、香河、宝坻、林亭镇、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该线前进，并不得有任何挑衅扰乱之行为。

2. 日军为确悉第一项之实行情形，可随时用飞机及其它方法视察，中国方面对之应加保护并予以各种便利。

3. 日军如确认中国军队撤至上述规定之线时，即不再越该线追击，且自动退归于长城之线。

4. 长城以南，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及以东地区内之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机关任之，但此项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

除此之外，尚有口头密约和谅解，未予公布。根据以上协定条文，国民党蒋介石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四省合法。

中国军队不得对日有“任何挑衅扰乱之行为”，就是要中国军队对进攻的日军采取恭顺态度，承认日军在中国领空领土内有权以军用飞机和其它方法监视中国军队之行动自由，中国不但不能反对，且应加保护和给予方便。所谓“确认”中国军队撤出该区之后，日军才“不再越线追击”，予日军随时作为越线追击中国军队进攻华北之借口。而拟定“日本军队自动退归长城之线”，无异承认该线定为中日之分界线。所谓“长城之线”其含义又极为含糊，从山海关至甘肃嘉峪关长达万里无不属“长城之线”，从而又予日军援引协定进驻长城以北察哈尔、内蒙广袤地域以合法权益。此外规定冀东地区中国军队不能进入，事实上已将该区划为特区，并对该区“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充任维持治安之警察，解除了任何自卫武装，为以后“中日亲善”、“冀东自治”及建立殷汝耕汉奸“冀东自治政府”奠定了基础。接着，黄郛被任命为国民党行政院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一系列事件接踵而来，华北形势日趋危急，这就是张家口事变前夕面临的华北危急形势。

二、张家口事变前夕，华北抗日运动

掀起了新的高潮

东北沦亡后，日本到处横行，成千成万的人民惨遭杀戮，抢劫、凌辱，家庭破碎，妻离子散，颠沛流离，饥寒交迫，无法生存。悲惨的亡国奴命运降临到每个人的头上，无比仇恨激发了东北人民，使人们不得不拿起武器抗击日寇。东北大军退入关内之后，数十万抗日义勇军转战辽、吉、黑各地，予凶残的日寇以无情的打击。其中我党领导的杨靖宇将军为首的东北

抗日联军在东满、北满的磐石、延边、汪清、珠河、密山、汤原、虎林、饶河等地英勇抗日，坚持十四年苦战，一直到东北解放、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在这一高潮直接推动之下，使平津及华北各地在党领导下的抗日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九·一八”后不到十天，北平的北京大学、北平大学、民国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师范大学等二十多所大学，平大附中、师大附中、一二三四五中等数十所中学，及天津北洋大学、南开大学、法商学院、师范学院、南开中学等大中学校数十万学生，纷纷组织抗日会、救国会、报国团，很快由各校组成北平及天津学生抗日联合会、中小学救国联合会、东北抗敌后援会、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发出抗日通电，分赴各地进行宣传，组织义勇军，自动进行武装集训。当时随着东北大军退入关内的东北各地的上层人士、东北军家属、东北各省难民及东北各地数万学生集结平津一带与东北留平津的学生很快的共同组织起来，并派代表在河北、山西、察哈尔、山东、河南等省及平汉、平绥、津浦沿线城市进行联络、宣传，很快建立了东北人民抗日救济会、难民救济总会、互济会、自救会等组织，控诉日本在东北各地屠杀、抢劫、奸淫的残暴罪行，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要求全国人民支援抗日义勇军及救济东北难胞。在这一时期中不少教授、名流、学者上层爱国人士也都卷入了抗日运动。北平财政部印刷厂以及公用、市政、邮务等工人，天津各纱厂、电车、电话工人，张家口的平绥铁路及市政工人，举行抗日集会及示威游行，抵制日货。在张家口愤怒的示威职工数百人砸毁了宣传“中日亲善”的日本马戏团的牌子，撕碎了日

本国旗，要求立即封闭日本驻张领事馆，驱逐日本领事出境。在北平由二百多团体发起召开了有二十多万人参加的空前盛大的太和门抗日救国市民大会，会议通过了《告全国民众书》，提出“立即组织民众，反对日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组织义勇军”、“救济东北流亡同胞”等决议。天津的青年学生在“九·一八”后不久，纷纷起来进行抗日救国工作，法商学院全体师生组织了学生军，加紧军事训练，发出了投笔从戎、为国捐躯的号召。成立了消费合作社，抵制日货，宣传爱国，提倡国货。全市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保定河北大学、第二师范、育德、同仁、六中等校学生都组织起来积极下乡宣传。天津工商界还组织了对日绝交委员会，查封私运之日货交由商会保管，听候处理；北平也组织了工业联合会，响应工人学生市民抗日运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六日井陉煤矿工人爆发了要求发“花红”举行罢工斗争，并通过了组织抗日义勇军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开滦四万工人举行五矿同盟罢工，反对英国资本家，要求发年关“花红”，声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及上海抗战的十九路军。

各地抗日运动的开展，又大大地推动了平津学生抗日运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北京大学在党的领导下发难组织南下请愿团。参加第一批南下的学生代表二百三十多人，于十二月一日出发，赴前门车站，站长阻止南下，不让学生上车，代表们举行了卧轨斗争。经过数小时坚持之后，争取了铁路工人的同情，最后站长只得答应了学生代表的要求，让学生代表乘车赴南京。接着北平、天津、太原、开封、西安、山东、青岛、徐州、武汉、南昌、福州、广州、上海、杭州、苏州、无锡等地学生也先后参加了这一请愿运动，十余万学生冲破了国

国民党政府各地军警的封锁及镇压，愤怒地冲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南下请愿运动”变成了反对国民党中央政府卖国投降的“南下示威运动”。十二月十七日三万学生包围了国民党中央党部、行政院，砸烂了国民党中央党部、行政院、外交部和《中央日报》社的牌子，遭到国民党南京警备司令部、宪兵司令部及数万军队、警察的逮捕、拘押、毒打及残酷的镇压，在珍珠桥对学生队伍开枪大屠杀，死伤学生数百人。因此，引起了全国人民无比的愤慨，北平学生为支援南下示威运动捣毁了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国民党动员了数万军队，分批将南下示威的学生押回北平、天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南下示威运动乃是北方出现的第一次抗日高潮。这一高潮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由两大激流——即由在东北以数十万抗击日寇的义勇军为代表的英勇战斗和在北方以平津学生抗日运动为代表坚决斗争汇合而成。它严重的打击了日寇进攻及国民党蒋介石卖国投降，直接支援了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以后的十九路军的上海抗日战争，迫使日本不得不停止对上海的进攻，蒋介石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下野出洋，前往日本。如果说南下示威，标志北方抗日运动新高潮，一九三三年春长城抗战，则是张家口事变前夕抗日高潮的继续发展。

继一九三二年南下示威之后，抗日运动普及到河北中小县城，由学生运动逐步深入到广大农村。为支援南下示威，在保定河北大学、第二师范、育德、同仁、六中等校先后举行了罢课游行；正定七中、井陉、晋县学生开展抗日救国工作；在永年、邢台，大名、清丰、南乐、磁县、巨鹿等县中心小学学生都掀起了抗日宣传、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等运动。大批组织下乡宣传队、远征队向广大农村农民进行宣传。保定同仁中学全

校学生组织了南下宣传纵队，下分七个大队分赴定县、石家庄、正定、新乐、沙河两岸进行宣传。在这一运动深入发展中，在一九三二年二月爆发了保定第二师范全校学生坚持反对国民党镇压救国运动的斗争。国民党当地政府于六月二十二日令数百军警严密包围、封锁学校，于七月六日全副武装的军警冲入校内开始残暴的屠杀。当场击毙贾良图等八人，重伤陈锡周等四人，逮捕三十八名，造成了骇人听闻的保定二师惨案。

在北方推动之下，出现了全国抗日高潮。中国工农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鄂豫皖红军也打垮了安徽陈调元、湖北何成浚、河南刘峙的进攻。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即工农兵劳动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建立了中国人民革命政府——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卖国投降。国民党内各部队出现了新的分化，许多部队反对蒋介石卖国投降，同情抗日，不愿打内战。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由赵博生同志率领的西北军二十六路军在江西宁都举行了光荣起义，参加红军。一九三二年十九路军抗击日寇的上海战争后，提出组织联合成立“国防政府”主张。我党中央在一九三二年在上海抗战期间，曾向国民党各派系军队再次发出通电，要求立即停止进攻我苏区红军，签订共同抗日协定。

在全国革命形势高涨之下，北方党于一九三二年六月下旬在上海召开了北方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东北、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代表。会议通过了《北方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的决议》，《关于北方各省职工运动中几个主要任务的决议》和《关于开展游击战争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

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反“北方落后论”，为迎接北方革命高潮重新部署了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工作。在东北扩大东北抗日联军，加强东北义勇军中的工作，坚持开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创建东满海龙、磐石、桦甸、抚松及北满虎林、饶河抗日根据地。在华北开展以平津及中小城镇学生抗日运动为基础，号召华北人民与士兵联合起来，抗击日寇武装保卫华北、保卫察哈尔。提出了反对国民党卖国投降，出卖东北、华北，反对第四次“围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争取民众抗日爱国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通过找各种关系和派遣学生到厂矿企业当工人，发展建立党和工会组织，开展在工人中抗日救国工作，组织、发动改善生活待遇斗争，武装工人，实行军训，开展武装反对日本进攻的斗争。在农村通过中小城镇小学教员开辟农民工作，领导组织农民斗争，提出废除苛捐杂税，要求减租减息，开展以工人、农民为基础的广泛抗日救国运动。利用招兵，派学生、工人和农民当兵，去开辟士兵中的抗日工作，提出改善士兵待遇、废止打骂等口号，联合民众开展华北抗日战争。在西北以陕甘边区为根据地，开展陕甘和陕北游击战争，组建红二十六军等。中央派了许多干部到东北、华北、西北去进行工作，加强满洲、北方、陕西等省党团领导。一九三二年底至一九三三年初，孔原、饶漱石等同志前来北方工作，孔原同志任党中央驻北方代表，饶漱石同志任全总华北办事处主任。

在党的北方会议之后，当时仅河北省党的组织为抗击日寇进攻华北，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卖国投降，从一九三二年夏至张家口事变即发动了大小十多次武装暴动。其中有名的有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三至三十日在保属高阳、蠡县的暴动（宋家庄、

南玉田、南北辛庄、西演等十几个村），九月在京东的迁安农民暴动，一九三二年一月在直南王维纲等同志领导的小车社斗争后进行的磁县暴动，一九三二年六月至一九三三年三月在直中灵寿、正定、新乐、行唐、藁城等县暴动，灵寿“红星暴动”及曲阳、阜平、行唐联合县委领导的曲阳水泉暴动等等。这些暴动由于当时客观条件不具备，或主观政治上的错误（包括路线错误在内），或力量薄弱，或缺乏经验，致使暴动都不免流于失败。其中还不包括若干次士兵起义，及开滦煤矿工人的武装斗争在内，但无论怎样，河北党及英雄的河北人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伟大战斗业绩，及其作出的不可估量的英勇牺牲是永放光芒的。它是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农村，进行武装群众，开展北方抗日战争，迈出决定意义的一步。

三、张家口抗日同盟军的兴起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九二四年一月国共合作，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在北方逐渐开展，李大钊同志就开始了系统的争取冯玉祥的工作，冯玉祥也就开始转向革命。一九二四年十月正当奉直战争紧急关头，发生冯倒戈反曹锟、吴佩孚直系军阀，在北京举行了政变，将所部改称为国民军。从而，占领京、津、冀、豫和内蒙等地，导致曹锟被掳，吴佩孚逃亡武汉。在国民军统治下，北方革命运动出现了新发展，特别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之后，京、津、京绥与张家口工人运动，河北、内蒙及河南农民运动进展很快。冯玉祥本人及西北军受到人民革命的影响，也进一步倾向于革命。

一九二六年三月日舰驶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还

击日舰，日本联合英、美等八国驻我国公使向中国提出严重抗议。三月十八日北京各界数千人集合天安门前示威反日，段祺瑞下令开枪，打死群众四、五十人，重伤二百余人，演成“三·一八”惨案。不久奉直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国民军退守南口入张家口、内蒙一带。这是反革命对冯玉祥的一次“教育”，使冯本人更决心参加革命，前往苏联联合苏联。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开始后，九月十五日冯玉祥由苏联返国，聘请了苏联顾问，并要求党派干部到他的部队进行政治工作。那时邓小平为首的一些干部在冯玉祥那里工作，其中有张振亚（河北蠡县人，在苏联学骑兵的，曾任冯玉祥的顾问）、刘伯坚（四川人，曾任冯的政治部主任）、肖明等同志。在他们帮助之下，于是年九月十七日在五原举行了宣誓仪式（即国民军五原誓师），冯玉祥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职，通电响应北伐军北伐，率领西北军入陕，于一九二六年底、二七年初统一了陕西全省。在西安创办了国民大学，开展革命启蒙教育及革命文化运动，从而大大的推动了西北建党工作的开展。西北的革命运动，特别陕西关中地区从此逐渐在学生、工人、农民中亦有了大的发展，学生会、工会、农民协会、农民自卫队等群众组织相继建立起来，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工农群众卷入到大革命历史时期中来，为陕甘播下了土地革命的火种。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冯玉祥动摇，党的代表相继撤出了冯部，但党的基础组织并未遭受破坏，党的工作仍未中断。而在绥远内蒙一带，自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央派了王若飞、曾涌泉等同志在那里开展工作，云泽（即乌兰夫）、吉合等蒙古同志也早在内蒙建立了人民革命党的组织和开展了艰苦的革命工作。北方党在平绥线的怀来、宣

化、张家口、怀安、大同、蔚县等地亦建立了一些党和群众组织，特别在几个师范学校、中小学校中发展了一些党员，建立了一些支部。这些都是张家口事变前党在内蒙的工作和基础。

在这里，还必须一提的是，自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到张家口事变前这一段时间之内冯玉祥的处境及其政治态度。冯玉祥本人长期徬徨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曾几次反蒋，如一九二九年三月参加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反蒋之战，一九三〇年二月到十二月与阎锡山联合反蒋进行中原大战，但均以失败而告终。反之，冯如投靠蒋，亦不为蒋所容，冯深知蒋对他和西北军乃一贯采取排斥、打击、分化、收买、消灭的政策，防不胜防。致使冯在恨蒋怕蒋之余，不得不长期对蒋应付，采取无可如何，若即若离，不前不后的态度。总之，这一时期中，冯亲身经历脱离共产党领导，深感政治上非常苦闷而没有出路。“九·一八”后全国人民奋起抗日反蒋，冯的这种态度有所改变，即从动摇中又逐步倾向于革命。

一九三三年四、五月，日寇相继占领长城各口、冀东各县及通县之后，乘机派遣东北伪军张海鹏部进占了察北沽源、宝昌、康保等县，平津及华北形势危急，国民党蒋介石继续实行其卖国投降政策，再次下令禁止中国军队进行任何抵抗，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以何应钦坐镇北平，主持军分会，直接指挥驻防平津一带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黄杰、关麟徵及蒋孝先的宪兵第三团，监视西北军、东北军及东北义勇军各部，防止抗日战争爆发。与此同时并对平津学生为代表的华北抗日救国运动进行血腥的镇压，逮捕屠杀中共党员及上层民主爱国人士。实行“文化围剿”，取缔封闭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文学研究会、美术家协会、社会科学研究会、民主保障同盟、

革命救济会及各种抗日群众组织，搜查、禁止发行抗日书报刊物《北方红旗》、《抗日救国报》，严禁抗日救国集会结社示威游行，……进一步激起人民的愤怒。

特别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我党领导下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再次发出宣言，声明在停止进攻我苏区红军、保证人民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三条件下，愿和全国各部队订立停战协定，联合抗日。在国民党各军队中得到积极的反应，尤其对处于平津、华北前线的西北军、东北军影响最大。如前所述，那时党在西北军中的工作，主要是开展抗日反蒋活动。冯玉祥及其领导下的西北军将领与我党均有上层联系，通过党的军委系统特别派往那里的同志，在上层关系掩护下作了许多工作。其中许多有名的共产党员如韩麟符（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十七个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之一的中共党员），宣侠父、席传忠等人。

在这一形势之下，经过党的长期工作，于是爆发了张家口事变。由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西北军将领率领的西北军，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张家口正式发布通电，宣布成立了华北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由冯玉祥任同盟军总司令，发表抗日同盟军成立的宗旨及其主张。吉鸿昌任张家口及平绥路警备司令部司令。张慕陶任政治部主任，宣侠父任参谋长，席传忠为教导团长。改组了察哈尔省政府及警察局，下令逮捕了汉奸卖国贼和国民党蒋介石“蓝衣社”特务分子。通令察哈尔境内实行戒严。积极部署察北及对热河的抗日军事行动。在各界御侮救亡会筹委会领导组织下，召集了察哈尔省和张口市各界人民二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并举行了示威游